

蔣委員長著



中國經濟學說

目次

- 一、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範圍
- 二、中國經濟學說的分別
- 三、中國古來的經濟規模
- 四、民生主義的經濟的道理
- 五、將來的經濟理想

中國經濟學說

蔣中正著

一 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範圍

甲 緒言

近百年來，中國經濟受西洋工商業的影響，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變化。在這個變化歷程之中，一般人要研究西洋的工商業的組織，當然也要研究西洋的經濟學說，因此，西洋的經濟學說便流行到中國的學者和社會裏面，而以正統派經濟學說與馬克斯經濟學說為最盛。中國自己的經濟的原理反而沒有人講求。今天如果我們提起中國經濟的原理，一般人一定不明白，他們不獨不明白，還有些人各自拘泥於他們平日所信所學的西洋經濟學說，對於中國固有的經濟學說，就是經濟的道理，亦未必能瞭解，更未必能接受。

社會上流行的經濟學說，所以不能繼承我們中國古來經濟學說悠久的淵源，近考我們中國經濟變遷的實況，預察我們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並樹立經濟的理想，以為我們經濟建設的歸趨，其原因在於百年來我們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一般學術思想界都養成了捨己耘人，重外輕內的傾向，而經濟思想界更直接的受了次殖民地經濟現狀的影響，因而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精神，沒有創造發明的魄力。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在於條約商埠尤其在於外國租界，經濟學者研究的對象，也偏於條約商埠尤其是外國租界的工商金融事業。條約商埠和租界的工商金融業，既附庸於外國的工商金融事業之

下，所以經濟學者。只知道襲取外國的成說，却忘記了我們中國自有悠久的歷史進化，自有特殊的地環境，自有立國的經濟規模和理論，還是很可痛心的事情。現在我們經過五十年國民革命的奮鬥，六年來抗戰的犧牲，已經把不平等條約撤廢了，只要我們全國國民繼續以最堅毅的精神，最堅苦的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中國就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我們的經濟建設，就可以依據獨立自由的計劃。所以我們在這個時機，要研究獨立自由的經濟計劃，更要樹立自由的經濟思想。還要知道，社會流行的經濟學說，只是一意襲取西洋的成說，殊不知西洋的經濟學說以西洋的經濟狀況為依據，而西洋的經濟狀況，有不斷的變化，最重大的變化，就是自第十九世紀進入了第二十世紀，歐美國商業的自由競爭轉為獨佔與集中。此種趨勢，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愈益顯明。國父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至二十年後的今日，第二次大戰爆發起來，規模更大，變化亦烈。世界的經濟又到了急轉的關頭，我們在這個時機，對於中西經濟學說應當重新檢討，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與世界經濟的改進，得一條光明的大道。

乙 中國經濟學的定義與說明

(子) 經濟學的定義

從人與物的關係來說，中國稱經濟學為「經世濟物之學」。從個體與全體的關係來說，中國稱經濟學為「國計民生之學」。我們可以說，經濟的原理，就是經世濟物的道理，亦就是國計民生的學理。簡言之，經濟學即致國家於富強之學，亦就是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的境域，簡言之，即「建國」之學。所以中國經濟的範圍，比西洋經濟學的範圍要廣得多。

(丑) 經濟學的本源與範圍

天地萬物都有其構成與存在之理。所以詩經說：「天不弔民，有物有則」。人爲萬物之一種，亦有其所以爲人之理，人所以爲人之理，稱爲人性。人有求生之欲，與一般生物相同，而人有能思之心，則爲人性之特質。書經說：「人爲萬物之靈」，即指能思之心，與由此心所發生的思慮與理性作用而言。中國的經濟學說，無論是儒家是法家，都討論人與物的關係，而其討論都以人類的理性與人類的欲望的關係爲中心，儒家求理性之擴充，法家主欲望之制約。儒家注意理性，故其學說之本源爲仁愛。法家注重欲望，故其學說之本源爲法度。這是兩家的分別。然而儒家的仁愛，就是人類的理性而言，法家的法度，是對人類的欲望而言。儒家之所欲擴充者爲理性，法家之所以要制欲者亦爲理性，所以中國的經濟學說，以理性爲本源，不以欲望爲本源。

天地萬物在宇宙之間，各依其所以構成與存在之理，而各有地位。我們如果體認此理，便可以使萬物各得其所。這就是中庸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中國哲學正統思想。依於這個思想，人不是彼此分離的個體，個體的小我是大我的一部份；物亦不是彼此分離的特質，任何事物都是全體的一部分。人與物的關係須從大我與全體的法則（理）裏面來觀察來處理，故中國的經濟學不以一個人或一個物爲本位，乃是以人類和社會的全體爲本位，與西洋各派經濟學說截然不同。

(寅) 經濟學的目的及其與哲學文化思想之關係

就生產要素而論，西洋經濟學舉出資本，勞力，土地之三者，並認此三者爲三種之物質而觀察而處理。我們中國的經濟學說，對生產要素則從人的方面來講求。大學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這句話有兩層意思，淺一點說，生產的要素是人力與土地，以人力開發土地，纔有物資，纔有財用。所謂物資，包含直接從土地生產出來的農產物和礦產物，間接從農礦產物加工而成的工業品兩類，中國的經濟原理，不列貨幣爲生產要素。中國的經濟學說，認爲物資不過是人力與地方的產物，而貨幣只是物資交換的一種媒介。故貨幣的本身，並不能成爲生產要素的一種。

深一點說，人之所以爲人者，在其有求生之欲，更在其有能思之心，人與一般的動物不同，能以思慮與理性指導其求生的活動。故人力有體力與智力兩種。人能以智力運用其體力，所以人的生產技術有不斷的進步，而其他動物的生產技術只限於他們的爪牙，而人可以戰勝一般動物。獨有優美的生活，是由於人有合群之性。人所以能合群而不爭不亂，又由於人有思慮與理性作用，以發展人群的組織。人群最高與最大的組織，就是社會和國家，社會和國家之力，更大於構成社會國家的個人力量之總和。個人的力量亦惟有在社會國家的群力之內，纔可以得到最大的發揮。離開了這個最高與最大的人群，個人便沒有生存的可能性，更沒有發揮其智力與體力以增進生靈的可能性。此種組織以及其依此以發展的法則，是人類能够增進其生產效能的又一個重要條件。

我們可以說，離開了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即物理與倫理），不獨人的生活爲不可能，亦且失去人之所以爲人的特質（人性），此依照自然與社會的法則的生活方法，稱爲文化。一般動物不能體認此種法則，換言之，不能體認宇宙間本然之理，以改進其生活。只有人能够體認宇宙間本然之理，故求生的活動便構成了文化的活動，而有不斷的進步。一切發明與創造，都是宇宙間本然之理的實現。中國人崇拜的古代帝王和聖賢，沒有一個不是能够體認宇宙間之理而有發明與創造，以改進人民的生

活的人。五千年來，創造網罟耒耜的伏羲，神農，發明文字與弧矢的倉頡，黃帝，中國人都是一樣的崇拜他們。要知道這些制作，都是爲了改進人民生活，使其一步一步達到理想境界，所以他們受後世的崇拜。如果離開了人民的食衣住行，來談文化，以爲生活之外還有文化，或竟以一知半解的寫作爲文化，未免輕蔑了文化。在中國的經濟的學說上，文化與民生是一體不可分的，民生之外無文化，文化之外亦無民生。

剛纔說過，社會國家是最大最高的人群，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面，從古以來，論生產不過是手工業農業，論交通不過用人力獸力，仍然生長一個偉大的國族，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前賢和先民「經世濟物」與「國計民生」的學問之深邃。我們看一看古來大政治家大經濟家對於理恆與欲望之間的思辨，對於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調理，對於文事與武備之間的配合，何等精密，何等周詳？其中最基本的學問和規劃，是求國計與民生的合一。在中國的經濟的學說上，國家的任務，一方面是養民，一方面是保民。就養民而論，國計就是民生，就保民而論，民生就是國計，簡單的說，就是國防。而其最精之一義，即在於民生與國防之爲一體而不可分。由中國的經濟學的意義來看西洋的經濟學，只不過是一種私人企業學，或是市場交易之學。我們中國的經濟學的對象，不止於私人企業或市場上的交易過程，而是民生與國防的統一體。由這個統一體來說，民生之外無國防，國防之外亦無民生。

綜括上面講述的話，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道理，是從宇宙的大我與民族國家的全體，來觀察並處理人與物的關係，是以理性來指導人類求生的活動。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再來尋繹「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的意義，就可以明瞭經濟學的目的。

就生產要素而論，中國的經濟學指出人力與土地，由人力開發土地以有物資，經濟學的目的，在以最小的時間與精力，發揮此三者的效能，至於最高度，國父說「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就是說我們要發揮人力，土地與物資的效能至於最高度。而發揮人力，土地與物資的效能，有法則，有層次，有目的。在法則的方面，我們知道宇宙間萬事萬物有其構成與存在之理。此理之在於特定事物者，稱爲此一事物之性。我們要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的效能至於最高度，必須依照人與土地物資的本然的法則（即本性）。我們要依照其本性，以發揮其效能，必須認識其本性。所以中國的經濟學說，以爲我們要盡人力與物力，必先「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在層次的方面，我們知道中國經濟學的原理，是推人以及物。孟子說「仁民而愛物」。中庸說「能盡人之性。故能盡物之性」我們要盡地力，必先認識人性，並發揮人性，至於最高度。人性的認識與發揮，最重要的方法有兩種：第一，是承繼民族固有的倫理，恢復民族本然的智能。第二，是趕上西洋進步的科學，運用西洋最新的技術。這樣纔可以盡物之性，因而盡物之力。在目的方面，我們用最小的時間與精力，本於文化的遺傳，依於進步的科學，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至於最高度，爲的是民生的改進與國防的充實。換言之，我們的經濟學，以養民與保民爲目的。申言之，西洋的經濟學說，以欲望尤其是個人小己的欲望——私欲爲出發點，充其所至，生產技術與國防技術，不獨不能爲民生服務，反而役使民生，甚至於毀滅人性。中國的經濟學說與此不同，我們的經濟學說以人性爲出發點，以民生爲目的，一切經濟制度與政策，首要順應人性，服務民生。孟子說「仁民而愛物」，最爲切至。我們要爲了人民，本於文

化的遺傳，依於科學的方法，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至於極高的限度，用之於民生與國防，這就是經濟學的目的。

二 中西經濟學說的分別

甲 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

上面說過的中國經濟學的本源與目的，是我從中國各派共同的學理裏面抽繹出來的要旨，我們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原不止於一派。凡是健全的理論與政策，必適合於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然環境，地理，氣候，歷史與民族精神，社會狀況。所處的國家不同，所遇的時代不同，則學說自有不同。古人說「即物窮理」，又曰「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就是說理論與政策必須適合於時代，適合於環境，不能够一成不變，中國古來的經濟學說有派別，有演變，就是這個道理。

遠在三千年前，周族從黃河上游向河淮江漢的流域發展，農工商業逐漸繁榮。這時候，我們中國產生了一位極偉大的經濟家，就是周公，周禮一書的著作與時代，古今學者雖辯說紛紜，未能確定，但其中多可考見爲周制；更證以詩經裏面，七月之章，大田甫田之作，以及孔子孟子稱述周制的言論，都足以使我們想見周代立國以井田制度爲根本，不獨兵制基於井田，即庠序的制度，亦基於井田。我們可以說，文化，民生與國防合一的立國規模，創自周公，亦非過喻。周公之後五百年，中國的農業便有進步，商業也發達起來。這時候，井田制度已經破壞了。周公的學說也湮沒了。農商之間，互

爲影響，發生各種問題，而學術思想也分出許多的流派。自春秋時代，管子，計然，白圭諸人，下至於戰國時代的百家，對於這些問題，都有討論。最重要的學派裏面，儒家與法家雖都認農業爲本業，而對於商業的政策，兩家主張各有不同，孟子荀子都主張「關稽而不征」，是一種放任主義；管仲鹽鐵都主張管制商業，平準物價，是一種干涉主義。這種爭論直與西漢時期。「鹽鐵論」作成有系統的記錄，可以與一千八百年之後，歐洲重商重農兩派的爭論作一個比較。

西漢以後，我們中國的經濟思想與制度政策，漸統一於儒家之下。在儒家的內部又分爲兩個派別；一派偏重於性理之學，一派偏重於功利之學。如北宋的張程（張載，程顥，程頤），一派即偏重性理，三蘇（蘇洵，蘇軾，蘇轍）一派，即偏重功利。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偏重性理，陳同甫（亮）葉水心（適）偏重功利。但是歷代的大經濟家，都是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而成爲系統，並且兼取儒家之說與法家之說而得其會通，如宋之范文正（仲淹）王荊公（安石），明之王陽明（守仁）張江陵（居正）都是理論與事功兩者並茂的大經濟家。

現在再就各派裏面。特別提出幾家來說明一下。春秋時代，齊國的魚鹽鐵器蠶絲等業都很繁盛，故齊國商業的力量，在國內操縱農民的生活，在國外支配黃河流域。這時候便有管子的學說，對於農商關係，價格問題，統制政策，國營事業，兵農制度，有詳細的討論。管子認爲生產要素只有人力與土地兩種，而尤以人力爲本源。八觀篇說：「民非穀不食，穀非力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作無以致財，天之所生，生於用力」，這與文學所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一樣的說法。管子對於農商的關係從價格問題着眼來求解決。黃金是人民交易的手段，穀米是人民生活的必需

品，金多則物賤，金少則物貴；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物賤則傷貨，金少則傷事；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管子的政策是國家要使金與穀的價格得到平衡，始可以平衡一般的物價，而求金穀的價格平衡，又必須取縮屯積而暢其流通。爲達物價平衡的目的，金與穀必須操於國家之手，而不可以操於豪強之手，物貴則緊縮金幣，穀貴則平糶穀米，如此則萬物可以流通。爲使國力增殖而民生不受豪強操縱，管子主張國家獨佔鹽鐵及山澤之利，並統制國外貿易。這種專賣政策對於後世，有很大的影響。管子對於兵農問題，有名的政策是「作內政寄於軍令」，自井田制度破壞以後，土地分配漸趨不均，故兵農亦漸趨分化，管子乃用這個政策編制農民，教以國事，使齊國舉國皆兵，而民生與國防更打成一片。商鞅的「農戰」政策，即以管子爲本，用於秦國，秦的軍隊竟能統一中原。這個政策對於後世的影響更大。

在西歷紀元前六世紀。中國已產生管子這樣的大經濟家。管子以後，經濟學說歷代都有名家，而經濟制度與政策，歷代都有變易。在第十一世紀之時，中國從二百多年藩鎮割據之中，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宋代）。土地的兼併，商業的發達，財政的困難，外患的侵逼，各種問題性質的嚴重，規模的宏大，遠在春秋時代的齊國之上，這時候，范仲淹首先主張改革學制與科舉，對於青年，要「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王荊公繼范氏之後，實行變法。他的學說是本於孔孟相傳的經學的。他說：「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這就是說經學就是經濟之學。不過經濟的設施，必須依「所遭之變，斯遇之勢」而定，故後世對於經學，只可以法其意，不可拘泥於其跡。他有這樣的見地，故與尋常的儒家不同。尋常的儒家多注意於節用，他獨

注重於增加生產，即所謂「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的政策以農興水利爲本，更進而裁抑兼併，平均賦役，周轉農本，使人盡其力。他對於國內商業，取締國行與邸店，實行所謂「市易務」與「免行錢」等辦法，使一般商販，不受壟斷，而後商品可以流通。他對於國外貿易，也與一般儒家不同，當時有一個傳統政策，禁止銅錢出口，因而對外貿易在沿海沿邊受極大的限制，他排除衆議，釋除銅錢出口之令，獎勵輸出入，以增國富。他對於國防，力主農兵制度，而從保甲着手，使國民都受軍事訓練，而期於舉國皆兵。

第十六世紀之中，明代開國的法度已壞，土地兼併，賦役不平；衛所的屯田廢弛，外患的侵凌益急。這時候，中國又有一個大經濟家，即張江陵。他的學說綜合性理之學與功利之學，且儒法兼用。他說：「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凡是實學，必可以實用，而實學必貫通性命與經濟。他爲政的要旨是「實事求是而不探虛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隱」，是「採其名必藉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簡言之，即「循名覈實，信賞必罰」。他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一般儒家批評他的政策是「霸道」，他說：「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諾爾戎兵。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我們要知道仁義與富強之道，本是一體。順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強之術就是霸術，以義爲本就是王道，以利爲本就是霸術，所以說「在心不在跡」。江陵本於這個道理，抑制兼併，丈量田畝，平均賦役，開通商務，整飭兵制，都有盛大功

這些大經濟家的理論各有不同之處，但論其本源與目的，莫不脈絡貫通。他們都不以人類的欲望爲出發點，尤其不以個人之小己的私欲爲出發點，他們的學說都本於人性，他們的目的都是國計民生，都是爲國計民生而致力於經濟的規制與統制。

他們的政策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但其間仍然有一貫的脈絡。他們的政策都以土地問題爲中心。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又都從農工關係上和農商關係上着想。商業的壟斷居奇與土地的兼併，是相通而相因的現象。土地兼併不獨影響國家的財政和人民的生計，亦且影響兵役和兵制，因而影響到國防。所以我們的國父在同盟會時代，就提出「平均地權」政策，足見得我們中國的土地問題在各種經濟問題中的地位重要，也足見得土地政策是各種經濟政策裏面的根本政策了。

乙 西洋的經濟學說及其最近的趨勢

西洋的經濟學說不止是一個系統。各國的自然環境，氣候，歷史與民族精神，社會狀況，各有不同，各國的經濟學說也不一樣。西歐在第十七第十八世紀時期，中古的農業經濟轉爲近代的商工經濟，於是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兩派經濟學說先後興起，重商主義者主張國家取干涉政策以保護商業，振興工業；重農主義者主張國家取放任政策，而以農業爲唯一之生產事業。重商主義重視貨幣，重農主義重視物資。至第十八世紀與第十九世紀之間，西歐的工業革命完成，其時英國學者亞丹斯密綜合兩派而著「原富」，風靡歐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盛極一時，到了第十九世紀中葉，德國的經濟思想便自成一個系統，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反對亞丹斯密的個人主義，而主張國家；反對

亞丹斯密的擔任政策，而傾向於保護政策，第二十世紀初期，斯密的「經濟學的基礎」等著作，更使德國的經濟思想轉入全體主義的一路。美國的經濟思想與英國同其本源，然而美國經濟學說對國際則採取保護政策，對國內則傾向於計劃經濟。此種傾向至第一次大戰以後更加有力。祇有英國還保持亞丹斯密的系統，而其中也有不少變遷。在十九世紀之內，李嘉圖的「經濟學與租稅原理」影響比「原富」更深。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馬薩爾斯的數理學派代亞丹斯密與李嘉圖的學說支配英國的思想界。霍布孫一派的福利經濟學漸臻於昌盛，馬克斯經濟學自命是由正統派經濟學轉變而來，然其思想方法乃是德國的理想主義的產物，與英國的經驗主義，淵源各自不同。列寧的學說以馬克斯為宗，而其對於政治經濟的理論和政策，與考茨基竟有大淵之別，俄國革命的前後，列寧與考茨基之論戰，亦即為馬克斯學派之內，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論戰，由此可見德俄兩國的馬克斯主義者，持論也各有差別。

西洋的經濟學說雖派別分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處。他們無論那一學派，總以人類的欲望為出發點，以推論經濟現象，而構成其學說系統。以亞丹斯密「原富」為開端，西洋的經濟學派聚訟的中心問題，就是價值問題。亞丹斯密以為社會是多數個人的集合，此多數的個人各為市場上交換價值而生產，各持其所生產的交換價值而自由交換於市場之中。貨幣即是市場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的表現，社會經濟不外乎無數的交換過程，故經濟學乃是價值學說，亦即是多數個人之間的交換關係的學說。馬克斯的「資本論」雖為「原富」的反對論，仍然以商品價值的分析為出發點。他以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商品的集合，而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的統一。他的學說仍然不出於價值學說的

範圍。我們再看西洋的經濟學，論價值的本源，雖有各種的說法，而總以人類的欲望爲依歸。第十九世紀之末，奧大利學派倡「邊際效用說」這一派的學說以爲商品的價值，是由人類對於商品的欲望而來。例如從一個饑餓的人看來，第一碗飯的價值大於第二碗飯的價值，第三碗以上的飯的效用，便到邊際，而價值也相隨減少。他們由這種淺顯的原則，推論價值的本質。這派學說，後來流行於美國。第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學者克拉克更推廣這種學理以解釋利息工資及地租等問題。與「邊際效用說」相反者爲「勞動價值」說，這個學說是馬克斯從李嘉圖價值論引伸出來的。這個學說以爲各種商品所以有使用價值，是因爲他們能夠滿足人類的欲望，各種商品所以有交換價值，是由於他們含有可以衡量的勞動量。例如五匹布能換一石米，因爲是五匹布所含的勞動量與一石米所含的勞動量相等，他們由此種原則推論價值的本質。至今共產主義者仍恪守成說，沒有多大變更。兩個學說雖持論相反，但推求他們立論的本源。都是人類的欲望。

在第十九世紀之中，西歐以外，新起的工業國家，爲與先進工業國家競爭，採取保護貿易政策。美國的經濟學說雖與英國同源，美國對於國際貿易，則與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相反，而取保護貿易政策。這個趨勢，對於經濟學說有很大的影響。上面說過德國李士特「國家經濟學」就是受了美國保護政策的影響的。第十九世紀進入第二十世紀以後，歐美諸國的工商業組織又從自由競爭變爲獨佔與集中，至第一次大戰之後，這種趨勢更加顯明，於是各國的經濟學說，也有相應的變化。如美國的制度經濟學者衛勃倫對於個人自利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說痛加批評，而以人類的天性爲一個出發點，以尋求人類經濟制度發展的法則。他對於人類的天性的本能的傾向，特重視人類非自私的本能，如

父母的天性，與服務的願望，認為社會福利與種族生命所以能够發展的因素。又如美國福利經濟學惠脫，與德國的斯盤相同，痛斥唯物論與利潤追求的經濟觀，他以為價值學說的經濟學，不過可以明瞭私有財產制度上各種問題，如果經濟學要達到最高的目的，即不可不建立社會福利的理論，故經濟學應以福利問題為中心。英國的福利經濟學者霍布孫，指斥李嘉圖以來的經濟學者，只注重於財富之生產，累積，交換與消費，此種經濟學不過為一種商業學，經濟學的目的，不止於財富的增殖，而須注意於勞動的管理的管制與生產物的正當的分配，及消費的適宜標準，使社會漸進於健全的社會福利的理想。由這幾家的學說，可以看出西洋的經濟學說最新的趨勢，亦是在人類的欲望之上。認識人類的天性，且於個人的小己之上，認識社會的有機體，因而經濟學的範圍，也超越價值學說之外，經濟學的目的，也超越利潤追求之上。我可以斷定此次大戰，將使這種新的趨勢更加明顯，更加深遠，此次大戰之後，西洋經濟學必將廢棄個人自利主義與唯物論，而以人性為本源，以民生為目的，和我中國固有的經濟學說將殊途同歸。

三 中國古來的經濟規模

中國的經濟的道理，不單是幾個學派和幾個大經濟家發明的，亦且是我們歷代的先哲和無數的先民運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犧牲他們的生命財產，繼續不斷的實行的。我們不只要講述古來的經濟學說，更要探究歷代的實際的經濟建設，才可以澈底明瞭我們中國的經濟的原理。國家的經濟本務，有養民與保民的兩方面來說明我們中國古來的經濟建設。

甲 國家養民的本務

人類要求生存，所以有各種的「欲」，有「欲」就有「求」。人類生存必需的「物」是有限的，人類的欲與求是無窮的，以有限的物資，供給人類無窮的欲求，人類便發生了鬭爭。農業社會的土地問題，工業社會的勞資問題都是由這樣來的。這些鬭爭有沒有止息的道理，有沒有止息的方法呢？有的，人類的天性原來是仁愛的，當然是有止息的道理和方法。就人類的個體而論，人的耳要聽好的聲音，目要看好的顏色，口要吃好的滋味，身要穿好的衣服，以致於要住好的房子要坐好的車輛。如果隨順他的耳目的欲求，這個人就受了物的役使，就跟着物去奔馳。這就是論語所說「小人喻於利」也就是大學所說「不仁者以身發財」。「以身發財」就是「亡身以殖貨」的意思。我們知道貨財是爲了人生的，現在因爲耳目口體受物的吸引。反而使人生殉了貨財，這就是「不仁」的現象。然而人的耳目，以心爲主宰。心能思慮，能打算，能辨別。人從許多欲望裏面，加以思慮；那一個欲望是不能够滿足的，那一個欲望是不應該滿足的；又從許多的物資裏面，加以打算；那一個物資是不能够求得的，那一個物資是不應該求得的；又從自己已經得到的物資裏面，加以辨別，那一個物資是不應該消費的，那一個物資是應該儲蓄的，那一個是公而有利的，那一個是私而有害的。一個人能够這樣，他的「求生」活動便成了有打算，有計劃，他就可以儲蓄財富，運用資力，擴大事業。

就人類的群體而論，人群的裏面，個人小己的欲望如沒有度量分界，則個人小己的欲望，必引起紛爭。荀子理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

，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屬於欲，兩者相持以長」。這一段話，將人類經濟構成的法則，講得很明白。我剛才說過，人的本性，以心爲耳目的主宰，所以人羣裏面，便有一種理性作用。這樣理性作用，爲使人羣裏面幾個分子，都能遂其生存，所以要有政府的組織，一面養人之欲，一面制人之欲。法則一定，分限一明，人便不至於跟着欲求走到鬭爭的路上去，社會上的財富也不至因爲來不及供應個人的欲望而致困窮。

無論是養欲或制欲，都需要一個管理衆人之事的政府來辦理。這一點是國家的經濟哲學的基礎。歐洲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以爲國家不應該干涉人民的經濟活動，主張經濟的自由與放任，反之，馬克斯經濟學說以爲國家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以杜絕個人的經濟自由。若由中國的經濟道理來看，這兩種學說都失之於偏。國家如不對人民的經濟活動確定分限，確定計劃，任人民流於鬭爭，只有招致社會混亂與民族困窮的結果。國家如不能養人民之欲，給人民之求，換句話說：如不能順應人民的欲望，保護人民的生計，則政府即不能算是盡到應有的職責，而人民的生活不能安定，以致於生產也不能發達。現在再分開來講國家養欲與制欲的實際設施。

(一)國家的經濟本務，由養育人民的欲求的方面來看，——孔子說「足食」，又說「既庶矣，然後富之」。孟子說：「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荀子也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以養百姓而安樂之」。由此可知在我們中國的經濟道理上，國家這種本務是積極的。依於這個積極的本務，歷代的政府有一貫的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舉其最重要的幾項來說：